

## 玄奘与瓜州二三事

宁瑞栋

(甘肃瓜州极旱荒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,甘肃 瓜州 736100)

[摘要]贞观初,玄奘从长安出发,经凉州到瓜州。在此停留一个多月,收徒买马,打听西去的路径。而玄奘西行的九死一生即在他匹马孤征、偷度玉门关、过五烽、度莫贺延碛之时。玄奘何时来到瓜州和何时出关,不见记载。玄奘从长安出发的时间,也即首途年月,文献和学界说法各异,至今未有定论。笔者因仰慕玄奘不畏艰险、追求真理的精神,谨对玄奘与瓜州相关的一些问题,谈点个人的观点,权作抛砖引玉。

[关键词]玄奘;瓜州;玉门关;瓠芦河

[中图分类号]K878.4 [文献标识码]A [文章编号]1005-3115(2011)018-0053-05

### 一、玄奘出关年月

要弄清玄奘出关的年月,先得弄清玄奘首途(从长安出发)的年月。唐人著录大都作贞观三年(929)秋八月或仲秋(《大唐西域记·记赞》、《续高僧传》、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、《大唐故三藏玄奘法师行状》、《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》、《开元录》、《唐新语》等),间有作三年季春三月(《法苑珠林》:“故以贞观三年季春三月,吊影单身,西寻圣迹。”)或四月(《慈恩传》卷5载玄奘在于阗的上表:“遂以贞观三年四月冒越宪章,私往天竺。”)。惟志磐《佛祖统纪》卷29作“正(贞)观二年上表游西竺,上允之”,道宣《广弘明集》卷22谓“元(玄)奘以贞观元年游西域”。

近代梁启超先生首创“玄奘元年首途留学”之说(1922),陈垣(援庵)先生则力持三年旧说不可推翻,始展开了学术上的争论。此后吕澂先生又主张二年西行与三年秋八月高昌发轫之说。杨廷福先生在对上述各种论点作了细致分析后,认为玄奘“以贞观元年秋八月”首途为当。周连宽先生则认为,“玄奘西行首途的年月应为贞观三年季春三月”。近年,温玉成、刘建华联名撰文,认为“玄奘自长安西行的时间应在贞观二年冬”,“玄奘偷度(玉门关)是在贞观三年四月”。国学大师季羨林先生1983年在《大唐西域记校注·前言》中取杨廷福“元年说”,2004年6月发表的《“丝绸之路”与西行行纪考》一文中,则又取周连宽的“三年说”。季先生只认为:“关于玄奘起程的年代问题,中外学者间争论颇大。主要有两说:一贞观元年,二贞观三年。”却没有表明支持何说。

杨廷福先生认为玄奘于贞观元年(927)秋八月从长安出发,“约在九月初抵凉州,停留月余,为新任都督李大亮所闻,逼令还京。幸赖当地慧威法师相助,密遣二弟子窃送向西,昼伏夜行,遂至瓜州”。杨先生的这一论点在史

学界影响甚大,但笔者认为值得商榷。

凉州西去瓜州1446里(据唐杜佑《通典》),玄奘和二弟子“昼伏夜行”,即使骑马也需10天左右。按杨先生之说,“玄奘约在九月初抵凉州,停留月余”,则是十月中旬或下旬离开凉州,到瓜州的时间,应在十月下旬或十一月上旬。玄奘在瓜州又“淹留月余”,偷度玉门关时,应已是腊月上中旬了。以笔者在瓜州工作生活整50年的体验,此时的瓜州,早已是“千里冰封”。就是“洄波甚急,深不可渡”的瓠芦河,也已冰冻三尺,何需费力“斩木为桥,布草填沙,驱马而过”。在气候更为恶劣的莫贺延碛,更是草干水枯,又哪里会有“青草数亩,供马恣食”?再者,玄奘在大漠上所见的“妖鬼魅影”,其实是戈壁上夏秋季白天晴朗时常见的蜃影(海市蜃楼现象),冬天则极为罕见。此外,玄奘从瓜州起身时,与他换马的胡老翁曾告诉他“西路险恶,沙河阻远,鬼魅热风,遇无免者”。胡老翁所说的“鬼魅热风”乃是瓜州戈壁中夏秋季常有的干热风。如是寒冬腊月,何来“鬼魅热风”?玄奘过第四烽后失道,欲饮时又失手将盛水的皮囊坠地,以致滴水不剩。“五日四夜无一滴沾喉,口腹干焦,几将殒绝,不复能进,遂卧沙中……至第五夜半。忽有凉风,触身冷快,如沐寒水”,这也正是秋季戈壁中昼夜温差悬殊的真实写照。凡此种足证明,玄奘应是在秋七八月偷度玉门关的。这样,他从长安出发的时间应该是在春末(三月)或夏初(四月)。如果玄奘是贞观元年(927)三四月从长安出发,他就又不可能在凉州见到新任都督李大亮。贞观元年(927)三至九月在凉州任都督的是宇文士及(三月起代,八月任,九月罢),而李大亮这时还远在交州都督任上。因此,笔者赞同陈垣和周连宽两先生的观点:玄奘应该是于贞观三年(929)三月末或四月初从长安出发,五月初抵凉州,六月中旬至瓜州。笔者同

时认为,辩机《大唐西域记·记赞》所说“贞观三年,仲秋朔旦,杖锡遐征”,应该是玄奘从瓜州出发的时间。理由有三:一是前述种种已证明玄奘是秋七八月偷度玉门关的;二是玄奘出征时“国政尚新,疆场未远”,玉门关即相当于国门,符合“杖锡遐征”;三是玄奘“冒越宪章”偷度玉门关,是其西征最为关键的第一步,他除了在所住寺院的弥勒像前启请佛祖保佑,自然也会精心选取一个有利于偷度的日子,“乃更贸衣资为买马而期焉”,而“朔旦”无月夜应是偷度最理想的时日。

温玉成与刘建华两位先生认为玄奘西行的时间,“应在贞观二年冬,而偷度玉门关的时间在贞观三年四月”。笔者同样认为于理不合:一是瓜州和莫贺延碛地处西北边陲,四月(农历)天气犹是乍暖还寒,胡老翁没有必要在这个季节用“鬼魅热风,遇未免者”来劝阻玄奘;二是温、刘两位先生,只注意到《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》(以下简称《慈恩传》)中“有‘青草数亩,下马咨食’的这些描述符合四月的气候”,但玄奘果真四月偷度玉门关,则八九月间即可抵达凌山(葱岭)。八九月正当秋高气爽,凌山无冰封之理,正好赶路,不会因“凌山雪路未开,不得进发”而在屈支“淹停六十余日”。因为,如果在屈支淹停60余日,反而错过翻越凌山的最佳季节。因此,温、刘两先生的论点不能成立。恰恰因为玄奘八月朔旦才离开瓜州,抵达凌山已是冬末春初,“凌山雪路未开,不得进发”,不得不在屈支“淹停六十余日”。

## 二、玄奘偷度的玉门关和瓠芦河

汉有河西地,设阳关、玉门关以为门户,隋唐移玉门关于晋昌东(也有学者认为早在东汉永平十七年(75)玉门关即已东迁)。时光流逝,斗转星移,物是人非,史料散佚,唐玉门关何在,竟成为一个千古谜团。虽然《大明一统志》记载有唐玉门关在“故瓜州西北一十八里”,却不为人所重视。近百年来,不少学者致力于唐玉门关的研究,但众说纷纭,迄无定论。

清光绪辛卯年(1891)随父赴新疆的陶保廉,路过双塔堡村的窟窿河,经他考证,认为窟窿河就是当年玄奘偷渡的瓠芦河,而最先将窟窿河比定为瓠芦河的人是《西域水道记》的作者徐松(1781~1848)。陶氏首创“唐时玉门关迁此”之说。1944年,阎文儒先生在亲赴双塔堡考察后,撰文肯定陶说“最为可靠”。阎文影响颇大,一时陶说几成定论。

1996年8月,敦煌研究院李正宇先生来瓜州考察。经瓜州县博物馆同志的介绍,笔者与李先生相识。交谈中李先生谈起唐玉门关址问题,他认为唐玉门关“必不在双塔堡一带”,“根据《瓜州都督府图经卷第三》所载瓜伊驿道加以推测,唐玉门关应在锁阳城、北桥子及踏实破城子之间三角地带范围内”。笔者当即忆及马圈村有两个古城

遗迹,那还是1957年刚来瓜州工作不久,笔者被派驻马圈村驻队,对这个村名感到奇怪,有村民告诉笔者,这里曾是当年樊梨花养马的地方,有个城圈样的遗址就是樊梨花的马圈,当然这只是稗官野史,不足为凭。文革中笔者又曾在这一带放过10多年的羊,对这里较为熟悉,马圈村正好在李先生划的三角区内。李先生听了笔者的介绍非常兴奋,决定去现场看看。随后,笔者陪李先生驱车到马圈考察。翌年,李先生的《新玉门关考》面世。笔者完全赞同李先生关于新玉门关的重新考定。近年,李并成先生撰写了《唐玉门关究竟在哪里》,提出一些新的看法,虽然在文章结尾认为“清双塔堡是否即古玉门关址,目前尚难定论”,实则仍然认为“唐玉门关确应位于双塔堡附近”,笔者对此不能苟同。

陶保廉以及后来的阎文儒先生,所以会以为唐玉门关在双塔堡,是因为当时的史学界对于瓜州故城址不清楚。“乾隆时,考古界以安西(今瓜州县城)西南六十里的瓜州口(今六工古城)为唐瓜州,俞浩《西域考古录》疑之,以布隆吉为唐瓜州,继又云在双塔堡则近似矣。”阎文儒先生亲临锁阳城考察后,只是认为锁阳城“或者就是唐代的瓜州城”。向达(觉民)先生也仅“私意以为唐瓜州治晋昌县,当即俗称为锁阳城之苦峪城”。之前劳干1942年来敦煌安西考察后,虽曾“定苦峪城(锁阳城)为唐瓜州城”,但因证据不足并未引起重视。直到20世纪80年代,孙修身先生撰文,犹认为瓜州故址在“今安西县布隆吉乡驻地南之肖家地古城址”。李并成先生当时也曾撰文“同意孙修身的看法”。这是因为元明以后驿路北移,锁阳城不当驿路,渐渐湮没不为人知。而陶氏基于认同唐瓜州(晋昌县)在双塔堡一带,才作出唐玉门关在双塔堡的判定。近年,李正宇、李并成先生先后据敦煌遗书《沙州都督府图经》“苦水”条作了考证,锁阳城即“唐瓜州”的身份才得以成为学术界的共识。笔者不能同意李并成先生坚持“唐玉门关在双塔堡”的理由,除了李正宇先生在《新玉门关考》中已述及的几点,笔者认为:

第一,位于双塔堡的窟窿河既不是当年玄奘偷渡的瓠芦河,也不是岑参《题苜蓿烽寄家人》诗中的葫芦河。《重修肃州新志·柳沟卫》云:“(窟窿河)旧名札噶尔乌珠,在双塔堡之东,发源土胡卢沟,东西分流,经双塔堡入苏勒河。”这说明窟窿河这一名称是清以后才有的。《岑参集校注》1981年第一版中,据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认为:“葫芦河为阿克苏河支流托什罕河(在今新疆乌什县境内)。”同书2004年修订本又据黄文弼《吐鲁番考古记》载《伊吾军屯田残籍》中有“苜蓿烽”,认为“苜蓿烽大抵亦当在伊州(今新疆哈密)境内”,并认为“葫芦河当在伊州附近”,同时也认为此“葫芦河”非《慈恩传》所记玉门关附近之“瓠

芦河”。李并成先生文中云：“《大唐西域记》亦曰：‘玉门关外有五烽，苜蓿烽其一也。’前已考及苜蓿烽很可能即是胡芦河（今疏勒河）岸边的大烽燧，它当为玉门关外第一烽。既如此，则玉门关无疑应在疏勒河岸边。”笔者遍检《大唐西域记》，没有找到并成先生引的“玉门关外有五烽，苜蓿烽其一也”这一句。而是在岑参《题苜蓿烽寄家人》诗注中有此句。《岑嘉州诗笺注》注云：“《升庵诗话补遗》、《秦边记略》、《唐诗解》引《西域记》均有‘玉门关外有五烽，苜蓿烽其一也’之句，检索今存《大唐西域记》各本均无此句，《法师传》则无后半句。”“玉门关外有五烽，苜蓿烽其一也”这句话显然不出自岑参本人，笔者认为明人杨慎（《升庵诗话补遗》）、唐汝询（《唐诗解》）等演绎出来的。前人批评杨慎“其论古考证之作范围颇广，但时有疏失”，“逞奇好胜，不免穿凿附会”，唐汝询“所注实多冗芜，不尽得古人之意，亦不尽得其所出”。

第二，李并成先生“考及苜蓿烽很可能即是葫芦河（今疏勒河）岸边的大烽燧，它当为玉门关外第一烽”，最先认为这个烽燧“或玉门关外之苜蓿烽欤”的是阎文儒先生，显然证据不足。而李并成先生进而认为“它当为玉门关外第一烽”则更值得商榷。《慈恩传》分明说“（玉门）关外西北又有五烽，候望者居之，各相去百里，中无水草”，“惟五烽下有水，必须夜到偷水而过”。玄奘幸运出关后，经 80 余里才“见第一烽，恐候者见，乃隐伏沙沟，至夜方发，到烽西见水下饮”。而所谓的苜蓿烽，东去双塔堡不过数里，又同处河边。则玄奘必不乏水，完全没有必要冒生命危险再到烽西去取水。所以，这个烽燧绝不会是“玉门关外第一烽”。

第三，李并成先生引斯坦因“不难拿我们测量的地势来证明，瓠芦河只能是疏勒河”。（斯坦因《玄奘沙州伊吾间之行程》），认为《慈恩传》“所记瓠芦河……应为今疏勒河干流”。向达先生 1944 年即已指出，“斯氏不知唐代瓜州治晋昌县在今安西县东，必以今安西西南 70 里之瓜州故城为即唐代瓜州治所，则不无千虑之失耳”。李正宇先生近年撰写的《玄奘瓜州、伊吾经行考》，也指出了斯坦因的这一考证失误之处。斯坦因是将“安西县城西南三十里的新瓜州城”当作了唐瓜州城。“此城筑于清雍正十一年（1733），并非唐代古城”，斯氏“以此城为座标，对瓠芦河、第一烽、第四烽、第五烽的位置进行一系列的比定，不免令人匪夷所思”。《大明一统志》云，唐玉门关在“故瓜州西北一十八里”，马圈村古城址东南距锁阳城正好 9 公里，东小西大，两城址相距又恰好 20 步，与《元和郡县志》所记“玉门关在（晋昌）县东二十步”正相吻合。历史文献中这一带又再无其他古城当之。所以笔者认为，《大明一统志》、《元和郡县志》的记载以及李正宇先生的考证是正确

的，唐玉门关应该在马圈村。

近年，李宏伟先生依据严耕望先生《唐代交通图考》卷 2 中说：“唐初玉门关在瓜州西北五十里之瓠芦河上，后迁至瓜州城近处。”又提出“瓜州县锁阳城镇常乐村的破城子，就是唐代玉门关所在地”的观点。其实，1943 年劳干先生也曾认为“此城（锁阳城）距河照（斯坦因的）Serindia 的图为 20 英里，与 50 里之数相近，正北有一城基名破城子，或是玉门旧关”。但《慈恩传》已写明玉门关置在瓠芦河上。而破城子附近并无河道遗迹，且破城子在锁阳城正西稍偏北。据李并成先生考证，“该城为汉代广至县城，唐代改置为悬泉府，五代宋初归义军时则置为悬泉镇，宋以后废置”。所以，笔者认为破城子不可能是唐玉门关。

### 三、第四烽外之野马泉

玄奘在第四烽受到王伯陇的“欣喜留宿，更施大皮囊及马麦相送”，并告诉玄奘“师不须向第五烽；彼人疏率，恐生异图。可于此去百里许有野马泉，更取水”。但玄奘“时行百余里失道，觅野马泉不得”，以致“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……几将殒绝”。野马泉何在？据李正宇先生考证，第四烽即今瓜州县北之大泉，唐第五道（伊吾道）之双泉驿（烽）。野马泉即应在大泉北约 50 公里处。大泉以北 4000 平方公里现为甘肃瓜州极旱荒漠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，笔者退休前即在保护区主管业务，曾主持过自然资源的本底调查（包括水资源），对这一带较为熟悉。北山地区地面水（井、泉）极为稀缺，有数的几个泉源都多次勘察过。近年，笔者与瓜州县博物馆的朋友几次陪李正宇、李并成先生到这些泉源查勘比照，希望能够找到王伯陇所指的野马泉，但都或因距离或因方位不相符而被否定。此后李正宇先生给我电传来他的新作《玄奘瓜州、伊吾经行考》一文，先生认为：“王伯陇所提供的路线，除了要避开第五烽的不虞之外，还要选择伊吾边界距离第四烽最近之处，尽可能少走弯路，同时又必有饮水补给处。今知第四烽（今大泉处）西北 80 公里即入伊吾国境，而且这一地段内唐朝不设防戍，第五烽（今马莲井处）又远在东北。据此，似可确定野马泉必在官道（第五道）以西：《玄奘传》载野马泉距第四烽‘百里许’……故其泉亦须于大泉西北求之。”笔者拜读后，忽觉茅塞顿开。想起退休前的一个秋末冬初，笔者带领职工巡查，在夜幕中迷了路，碰到了一条长满芦苇和柽柳的小溪，就地宿营。第二天清晨，从地图上确认这里叫芦苇井，在大泉西北，相距 46 公里。处在季节性河流红柳河中，准确地说，红柳河只是一条泄洪沟，大部分时节无水。而芦苇井的水几乎长年流淌，大约二三百米远才渗入地下。两岸芦苇和柽柳高大茂密，只是水质咸苦难咽。沿沟一条大路向西 10 多公里到兰新铁路的红



柳河车站,东北可达 312 国道的星星峡。这个芦苇井极有可能就是当年的野马泉。

#### 四、玄奘与象牙佛

榆林窟有一件传世珍宝——象牙佛,也叫象牙造像,因为没有文献记载,它的来历至今还是一个谜。1925 年,陈万里先生在其《西行日记》中提到了它,陈先生还有幸在安西县署见到过象牙造像,并为之拍照拓印,“断定该件系印度作品,且由此推定必为唐代西游僧侣所携归者”。1955 年,阎文儒先生在其《谈象牙造像》一文中,从造像的本身作了试探性说明。阎先生认为:“从造像内外的各方面来看,应该是印度的作品,同时更可说明是印度恒河上流秣罗,或是北部犍陀罗地方的雕刻品,可能是中国到印度求法僧人携带回来供养的。”并认为“这个象牙造像的时代,多半是在印度佛教艺术第三期中,从七、八世纪到十一世纪的阶段内”。据榆林窟清光绪三十一年(1905)《请回象牙佛匾文记》的记载,“相传国初某僧获于石洞积沙中”。清末民初兵荒马乱,榆林窟几任住持道人皆因为象牙佛惨遭杀害。末任住持道人郭元亨,也为保护象牙佛,被军阀马步康的部下吊打、火烧致残。为使象牙佛不落入匪人之手,郭元亨不得不将其藏于深山 10 多年。直至 1950 年春,才交给安西县人民政府。20 世纪 40 年代,于右任、张大千、向达、夏鼐、阎文儒等社会名流和知名学者先后来到榆林窟,想一睹象牙佛而不得。1954 年,甘肃省博物馆在兰州五泉山公园内举办文物展,当时正在兰州上学的笔者,有幸一睹真容,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1957 年,笔者来到瓜州工作,多次听到有关它的种种传闻。1960 年冬,笔者在榆林窟和郭元亨相处过一些时日,又有幸听他讲述其曲折的一生以及有关象牙佛的故事。20 世纪 80 年代,瓜州县副县长裴传哲从北京请回象牙佛的复制件,也曾交给笔者保存过几天。此后复制件在展出时发生被盗事件(后案破追回)之后,笔者又受县博物馆张淳馆长之托,借去北京出差之便,请北京象牙雕刻传人李万顺先生依原样再复制两件供展出。

这尊象牙造像究竟是谁从印度带回来并供奉在榆林窟,文献不见记载。陈万里、阎文儒先生均认为,应是西游僧人带回来并供奉在这里的。唐时西去求法的僧人不少,但谁有条件把这件稀世珍宝带回来,又为何放在瓜州?“原敦煌艺术研究所所长常书鸿先生生前,依据考证,认为此造像很可能是玄奘法师赴印度取经返回时,由寺院高僧所赠,带回入藏榆林窟的。因玄奘法师赴印度取经历尽艰险,途经瓜州,得到节度使(应为刺史)独孤达‘奉事殷厚’,州吏李昌冒着被朝廷杀头的危险,当着玄奘面毁却缉拿他的文书,放他西去。正因此缘故,玄奘为答谢独孤达、李昌,将象牙造像敬赠榆林窟,成为镇山之宝”。但

李春元先生认为:“常书鸿先生推论无文献记载,不能立为其说(原文如此)。”李春元认为:“王玄策身为唐帝国外交使节,出使西域数次,为表示中印两国友好往来,印度高僧赠奉象牙造像至大唐未尝不可。榆林窟乃丝路名寺,又为中外使节、商贾、僧人朝胜(圣)之地,王玄策由印度所携造像入藏该窟亦在情理之中。”笔者认为,王玄策曾四次作为大唐使节出使印度,第三次出使返回(唐高宗显庆五年即 660)时,菩提寺寺主戒龙回赠了象牙佛塔等礼品(《法苑珠林》)。但王玄策与玄奘不同,作为朝廷使节,他没有权力随意处置外国献给皇帝的贡品,也没有理由这样做。而且,王玄策第二、三次出使,极有可能走的是唐蕃道。贞观十五年(641),文成公主嫁给了松赞干布,唐蕃道通。因为路径便捷,这一时期往印度的僧侣多走此道,王玄策要出使的,除了印度还有尼婆罗国(今尼泊尔),他不会舍近求远绕道瓜州。所以笔者认为,常书鸿先生生前的推测是有道理的:

首先,玄奘最有条件从印度带回象牙造像。据《法师传》,玄奘回国时除经书和舍利子,还带回六躯金银铸造和檀香木雕刻的佛像,惟独没有象牙造像。象牙造像在印度也应是极其珍贵的,这从菩提寺寺主戒龙向唐使王玄策赠送象牙佛塔可证明,以玄奘在印度的显赫风光,他也最有条件得到和带回象牙造像,正是象牙佛的珍贵,其他求法僧显然不具备这个条件。其次,正如常书鸿先生所说,玄奘最有理由将带回来的象牙造像放在瓜州,在瓜州对他有恩的不只是独孤达和李昌,还有第一烽、第四烽的校尉王祥、王伯陇。但他们作为朝廷官员,这样做毕竟是徇私枉法,为了不给这些帮助过他的人们带来不必要的麻烦,玄奘只能默默报答。所以,他才会将最珍贵的象牙造像留在了瓜州,却没有明言,以致成为千古之谜。

#### 五、第一烽

李并成先生认为玉门关外第一烽是双塔堡西(今双塔水库西)疏勒河北岸之大烽燧,笔者前面已辨其非是。李正宇先生近作《玄奘瓜州、伊吾经行考》考得(第一烽)“在今安西四工农场西十里沙井子处”。笔者赞同李先生所琢磨的玄奘“从锁阳城出发,傍官道东侧向北,在马圈及桥子村之间渡过瓠芦河;又西北经土疙瘩湾向北,入十工山南干沟口子(又名桥子口子)穿过十工山,向西北直趋第一烽”。但李先生认为第一烽在沙井子,却也值得商榷。李先生据《沙州都督府图经》所载“莫贺延碛道十驿”的记述,认为出南干口子走莫贺延碛道,必须绕道常乐(今六工古城)再北上至新井驿,而这个新井驿就是第一烽。新井驿南距常乐 27 里,常乐境内有疏勒河(古称独利水)从东向西流过,玄奘如往新井驿(第一烽)方向,必然要先过疏勒河,自然不应乏水。同样没有必要冒险去烽下

# 唐代瓜州晋昌郡治及其有关问题考

孙修身

(敦煌研究院,甘肃 敦煌 736200)

[摘要]解放前,在敦煌莫高窟第 130 窟甬道,剥除表层的宋代壁画后,显露出底层所绘的男女供养人多身,其中北壁西向第一身为男供养人,其题名结衔是“朝散大夫,使持节,都督晋昌郡诸军事,宋晋昌郡太宋乐庭环供养时”。自剥出此题后,即被认为是研究该窟和敦煌莫高窟发展史的重要资料,出现在许多学者的专著和论文中。但是,数十年中,人们对于其中所见的“晋昌郡”及其治所到底是在哪里不是尚未讨论,就是议论纷纷、莫衷一是。鉴于上述情况,更兼此条题记在研治敦煌学方面的重要性,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其作出讨论。

[关键词]瓜州;晋昌郡治所;莫高窟第 130 窟

[中图分类号]K928.6 [文献标识码]A [文章编号]1005-3115(2011)018-0057-08

## 一、敦煌莫高窟第 130 窟所见瓜州晋昌郡治域所在

题名结衔中所见的“晋昌郡”在何地?根据目前翻阅到的资料可知,在我国的西晋之前无此地名,而在两晋南北朝时期,以“晋昌郡”名地者又非一地,其情况是:

第一,西晋置晋昌郡,在南朝刘宋时期废置,南齐复置,后为西魏占有,入于北朝的治域,改名为魏昌郡,

自此而后,该地再无复用“晋昌郡”之名。经调查和考证,知其故治是在今陕西省南部、汉水流域的石泉县县治中。

第二,西晋置晋昌郡,北周改名为“永兴郡”,隋朝废置,唐玄宗天宝元年(742)复名“晋昌郡”,至唐肃宗乾元元年(786)再改名为“瓜州”,此后再无复用旧名。经调查考证和研究,笔者认为其故治在今甘肃省河西

取水。所以笔者认为第一烽不应在沙井子。

根据笔者在这一带多年来的考察,今瓜州县城北 30 公里的涧泉子最有可能是第一烽。涧泉子西偏北距白墩子(第二烽广显驿)16.5 公里(约 29 唐里),北偏东距石板墩(汉代烽燧)12 公里(21.4 唐里),东南距南干沟口 39 公

里(约 60 唐里)。从涧泉子向西北 72 公里(128 唐里)可径直抵达第四烽(双泉驿)。此泉水量充沛(据 50000:1 地形图标注,该泉可供 100 人饮用),且地势险要。虽然目前暂时没有发现烽燧遗址,古时不会不派重兵驻守。所以,笔者认为第一烽应该在此处。

## [参考文献]

- [1]杨廷福.玄奘年谱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8.
- [2]周连宽.大唐西域记史地研究丛稿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4.
- [3]温玉成,刘建华.玄奘生平几个问题的再考订[J].文物春秋,2005,(1).
- [4]季羨林.“丝绸之路”与西行纪考[J].中国海洋大学学报,2004,(6).
- [5]欧阳修,宋祁等.新唐书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95.
- [6]陶保廉.辛卯侍行记[M].兰州:甘肃人民出版社,2002.
- [7]李正宇.新玉门关[J].敦煌研究,1997,(3).
- [8]李并成.唐玉门关究竟在哪里[J].西北师范大学学报(社科版),2000,(4).
- [9]向达.两关杂考[A].敦煌阳关玉门关论文选萃[C].兰州:甘肃人民出版社,2003.
- [10]劳贞一.阳关遗址的过去与未来[A].敦煌阳关玉门关论文选萃[C].兰州:甘肃人民出版社,2003.
- [11]孙修身.唐代瓜州晋昌郡郡治及其有关问题考[J].敦煌研究,1986,(3).
- [12]李并成.沙州土镜之地理调查与考释[J].敦煌学辑刊,1990,(2).
- [13]陈铁民,侯忠义.岑参集校注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1.
- [14]廖立注.岑嘉州诗笺注[M].北京:中华书局,2004.
- [15]李旭东.瓜州历史文化论集[M].香港:香港天马出版有限公司,2006.
- [16]李宏伟.中国之最话瓜州[M].兰州:甘肃地质印刷厂,2006.
- [17]劳干.两关遗址考[A].敦煌阳关玉门关论文选萃[C].兰州:甘肃人民出版社,2003.
- [18]李并成.大漠中的历史丰碑[M].兰州:甘肃人民出版社,2006.